

刘立凯 杨进保 编

红都见闻录

上

苏联二十至五十年代重大
事件和人物活动史实选粹



经济日报出版社

红都见闻录

——苏联二十至五十年代重大事件
和人物活动史实选粹

(上)

刘立凯 杨进保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越
特邀编辑：袁 放
责任校对：田 霖
封面设计：郭景云

红都见闻录

HONGDU JIANWEN LU

刘立凯 杨进保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宣武区虎坊桥福州馆前街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地质矿产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35.25印张 850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套

ISBN 7-80036-350-3/K·6

定价：18.5元

前 言

为了进行学术研究和供历史教学参考之用，本书精选了记述一批苏联20至50年代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活动史实的资料（其中大部分为苏联人所作），其特点是：

（一）注意全面性，不偏重于某一派别的人和事，尽量选入对苏联的现代社会产生过重大的或一定作用和影响的各个派别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文学家等）的生平事迹、理论与实践活动及其结局的资料。

（二）着眼于各篇文章的资料价值，选取有丰富的历史事实和具体内容的资料，凡缺乏具体历史事实的纯理论性、分析性、批判性文章，概不收入。

（三）注意选取新资料和真实资料，其中包括苏联报刊近几年来陆续发表的鲜为人知的真实资料，以及国家档案中的绝密资料。

（四）凡几位作者追述同一历史事件和人物而具体情况不一致时，本书则一并收入。

（五）每篇资料的作者，都不可避免地持有自己的观点和当时的人和事的评价。本书之所以选取这些资料，完全是为了供研究参考之用，并不表明编者同意他们的观点和评价。

（六）注意文章的可读性。由于有些资料的作者，系当事人的亲属或知心朋友，有的作者则是苏联著名作家，他们同被回忆者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友谊，因而他们的文章写得真挚、亲切、具体、生动，读起来使人深受感动。这些回忆文章，也可以算得上是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最后，我们对选入本书的中文译作者表示感谢。

编 者

目 录

关于列宁的“遗嘱”	(1)
“三驾马车”时期的夺权斗争	鲍里斯·巴扎诺夫 (20)
越飞之自杀及其遗书	(41)
鲍罗廷——孙中山的顾问	(49)
加伦(布留赫尔)——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苏]А.И.卡尔图诺娃 (57)
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克列斯京斯基	[苏]娜·尼·克列斯京斯基、Н.波波夫 (87)
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之死	(93)
农业集体化见闻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 (103)
1928—1931年的政治审讯案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 (110)
米高扬回忆斯大林	[苏]阿·伊·米高扬 (131)
谁是刺杀基洛夫的真正凶手?	(138)
一、Б.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论述	
二、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记叙	
三、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的回忆	
四、赫鲁晓夫的回忆	
五、莉季娅·诺德的回忆	
六、阿夫托尔哈诺夫的回忆	
七、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记叙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	[苏]德米特里·谢列斯托夫 (183)

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加米涅夫.....	(195)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审记	
..... [苏]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209)
著名政治活动家、经济专家皮达科夫	
.....[苏]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228)
著名国际工人运动领袖和政治活动家拉狄克.....	(241)
刚直不阿的政治家奥尔忠尼启泽.....	(248)
布哈林的悲剧.....[苏]罗·伊·麦德维杰夫	(259)
布哈林自传.....[苏]尼·伊·布哈林	(273)
布哈林——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权威	
.....[美]悉尼·海特曼	(278)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	
..... [苏]鲁斯兰·雷涅夫	(293)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托姆斯基	
..... [苏]德·舍利斯托夫	(304)
宁死不屈的老革命家叶努启泽.....	(309)
托洛茨基被刺案始末记.....[日]加濑俊一	(334)
亚果达的下场.....[苏]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361)
叶若夫浮沉录.....	(372)
维辛斯基其人.....[苏]阿尔卡季·瓦克斯贝格	(380)
贝利亚升官记.....[苏]罗·伊·麦德维杰夫	(389)
贝利亚的末日.....[苏]安·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	(394)

关于列宁的“遗嘱”

——访问瑙莫夫

[苏]《真理报》

《真理报》编者按语：编辑部收到的信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谈及我国发生已久的往事。党的有关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70周年的文件，使这样的来信增多了。甚至在苏共中央全会才开过不久、戈尔巴乔夫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发表后的今天，读者们对这个题目仍抱有浓厚的兴趣。半个世纪前早已过去的往事，好像今天的问题和任务一样，使人们激动。可以大胆地说：认识历史，是全体苏联人的迫切需要。须知，人们注意往事，不单单是为了满足求知欲望；而且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关切和理解，想了解反人民的犯罪行为是怎样与人民的英雄业绩同时发生的，想知道今天应该以什么为武器，而哪些东西已经过时了。

读者们可以发现，近期的报纸、杂志上登载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包括与列宁的政治遗嘱有关的资料。尽管这些资料明白易懂，然而外行的读者有时仍难以弄清楚：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虚构；哪些是严肃的科学探讨，是以诚实的态度解释原始文件；而哪些则是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别有用心地搜集事实和事件，或把别人的话去掉引号当成了自己的话。许多读者希望，《真理报》能够更广泛地涉及历史题材，抓住那些极其尖锐复杂、意义特别重大的事件，抓住那些至今模糊不清，存在着各种积垢和猜测的历史“空白点”。

编辑部和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共同商定：登载系列性资料，专门探讨党史和苏维埃国家史上那些意义重大的事件。

这个系列性资料，将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科学院院士斯米尔诺夫编辑。

今天，我们对列宁于1922年12月底至1923年1月初的口授记录作纪实性报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家人、朋友和战友们把它们称为遗嘱。对这些文件作解释的是历史学博士璠莫夫，他是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一个部门的领导人。

“……他们不能禁止我思考”

璠莫夫：让我们来看一看文献、回忆录和可靠的事实吧。它们会更好地向我们作出说明。

列宁是在哪儿口授自己最后的著作的？下面是克里姆林官房管处工作人员梅捷列夫的回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36平方俄尺（那是苏维埃法律允许每个担负一定职务的共和国公民可以享有的面积），只有一个窗子。房间里放着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一张金属双人床，一个不大的柜子，一个或两个圈椅，这就是全部的东西……”

“他的住室位置极不方便：一侧是一个小食堂，一侧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房间。凡是要进这边或那边房间的人，必须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门前经过，无意中就制造了骚扰和声响。人们曾多次徒劳地建议他换一个好一点大一点的房间，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本不予理睬。”

列宁是怎样口授的？让我们听听女速记员秘书是怎么讲的吧。玛丽娅·阿基莫芙娜·沃洛迪切娃首先说：

“他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旁边放着一张小桌子，我就坐在桌子旁边记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很随和地、同志式地伸出左手高兴地向我问好，总是担心我值班的次数是否太多，为什么我脸色这么苍白，问我们是否严格遵守值班次序，并挥动手指威胁似的说：‘您要当心，否则我……’如果失去在弗拉基米尔·伊

里奇身边工作的机会，失去经常看到他、听他讲话的机会，即使到最好的疗养院去休养，对我来说，仍然是最沉重的惩罚。”

以下是莉季娅·阿历克山德洛夫娜·福齐耶娃的回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的时间增加到一天20分钟，随后达到40分钟，分两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超过这个界限，继续口授开始了的文章。实际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工作明显地多于给他规定的时间。在口授过程中，有时候他还读一读先前口授的并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内容……

“可以有把握地说，白天和晚上醒着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在考虑他认为必须立即告诉党、必须在有限的口授时间内讲述的内容。

“必须口授，而不能亲自动手写，无疑，这使列宁感到很不方便。他在有病以前不喜欢口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习惯于看着面前写好的文章，而口授时则没有这个条件，这使他感到不便。他每口授完一句话，要停下来进一步深思熟虑，女速记员也停下来，等着继续工作，这种情形使他感到拘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量使自己习惯于口授，他请求女速记员带上一本书，以便在暂停的时候读一读。”

玛丽娅·伊格纳季耶夫娜·格良谢尔回忆说：

“过去，列宁总是企图加快自己工作的速度，仿佛他害怕来不及做完自己打算做的一切。而在最后的工作期间内——从1922年11月到1923年3月，每天只能支配半个小时（偶尔多一点，有时少一点）。他拼命地要把一切需要说、需要做的尽快赶完。随着他的健康状况的改善（尽管改善不多），他往日的精力和主动精神又恢复了。但他显然不甘心做一个‘静心养病的病人’，这自然又引起了病情的恶化。”

沃洛迪切娃回忆道：

“1922年12月底到1923年3月初，病情中止了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的工作。即使在这段时间内，他也从不给人一种生病的感觉。他仍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目光那么敏锐地、不倦地遥望着远方，思想是那样的深邃，心脏为劳动人民而跳动着。他的精神力量给人的感染是那样强烈，以致使人觉得，躺着口述，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在自己办公室里工作——只是一个暂时的、小小的障碍，毫无疑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快就能把它制服，因为还没有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能克服的困难。”

从1922年12月底到1923年3月，列宁就这样口述了自己最后的著作。有一次他开玩笑地对女速记员说：“我们和您已经写了两个冬天了。”

环境……关于环境能说什么呢？没什么好说的。仍旧是医生规定的严格制度，仍旧是在新的总书记警觉、严格的监督之下。这位总书记以他所特有的没有任何温情的冷峻的意志和铁的逻辑，执行政治局的指示：禁止通信，禁止会面，无论朋友还是家人，都应该不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任何政治生活方面的事情。下面是福齐耶娃的记录：“……1月29日，斯大林来电话说，除了中央政治局，别人不能给材料。他问我有没有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过什么多余的话，关于目前形势他是从哪儿得知的？”

记者：这里指的是什么样的材料？有意思的是，列宁是如何对待断然拒绝给他送材料这件事的？

瑞莫夫：这里说的是“格鲁吉亚问题”。我们以后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们会详细阐述这一切的。现在我先讲下面一件事。福齐耶娃向列宁讲了和斯大林进行的这次谈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要设法获得材料。

我们再援引福齐耶娃与此有关的另一段笔记。

“在谈到关于格鲁吉亚委员会的问题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说：‘这可不是报纸，也就是说，我现在就可以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情绪很好。”

玛丽娅·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回忆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以后，医生尽力用各种办法限制他工作，而我们也总是劝他必须减少一些工作。他有一次听到我的劝说后讲：‘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这是真正的实话。他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革命工作。没有革命工作，他就觉得好像鱼儿离开了水。到后来，列宁已经不能起床，医生见他心情郁闷，就决定对他宽松一点，建议他和同志们见见面，但有一个条件：不和他们谈政治。他断然拒绝了这个条件。‘这些怪人’，医生离开以后，他对我们说：‘他们竟以为政治活动家在久别之后能够不谈政治，而去谈别的东西。’后来，当他想要口授自己的笔记、自己最后的文章时，医生也曾对此表示反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如果拒绝他这个要求，他就彻底停止治疗。”

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很简短的话：“伊里奇常常对我说，要知道，他们（也包括我）不能禁止我思考”。

是的。列宁还是那么意志坚强，还是那么笑容可掬，体察人们的要求、需要及情绪。现在倒可以把他称作“克里姆林宫的隐居者”，但是，他很高兴见到每一个新人，并很快地开始交谈。

他从不埋怨任何人，只是有时候为不能把他想做的一切做完而感到遗憾。

1923年2月1日，福齐耶娃在值班秘书日记中写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说（开始是失言，后来则重复地说）：‘如果我获得自由，我自己会轻而易举地把这一切完成。’”

在与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娅·伊里尼奇娜的谈话中，列宁半开玩笑半忧郁地说：“1917年帝俄白匪军的追捕使我得以在谢斯特罗烈茨克的窝棚里休息；1918年，承蒙卡普兰的子弹而休息；再后来，再也没有这等好事了……”

这次谈话是在1923年3月初，在口授了最后的著作《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以后不几天，列宁又有了新的考虑，新的幻想，

但不能实现了……

严格用事实说话

——您想知道《给代表大会的信》是怎样写成的吗？——**瑙莫夫**问。——请吧，没有任何秘密。我们要从书架上拿出《**列宁全集**》第45卷。瞧，在第45卷的后面，从第455页起，登载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值班秘书日记》。它记载着**列宁**嘱托的事务，**列宁**同来访者的会见，以及自1922年11月21日到1923年3月6日期间的其它事情。日记的记录者是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秘书**福齐耶娃**、秘书助理**沃洛迪切娃**，以及秘书**阿利路也娃**、**格利亚塞尔**、**弗拉克谢尔曼**和图书管理员**马努查里扬茨**。

然后，我们翻开《**列宁年谱**》第12卷，这里详细记载了**伊里奇**每天的活动。我们还需要**福齐耶娃**写的《回忆**弗·伊·列宁**（1922年12月—1923年3月）》这部书，它是政治书籍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

这三部为历史学家熟知的著作就摆在我们面前。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辑成一本特殊的日记。我们从1922年12月12日开始。

必须说一下，我们的记录不是面面俱到的。

1922年12月12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上午从**哥尔克村**回到**莫斯科**，11点15分来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呆了一会儿，便回家去了。12点他又回到办公室，同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们谈话，直到下午两点……晚上，**列宁**在5点30分来到办公室，打了一会儿电话。从6点到6点45分，他同刚从**梯弗里斯**返回的**捷尔任斯基**谈话，内容是关于**南高加索边区党委会**和**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冲突问题。这次谈话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激动。此后，他还研究了对外贸易垄断

问题。晚上8点15分，他回家了。谁都没想到，1922年12月12日，是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12月13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两次发病。尽管如此，医生们好不容易才说服他同意暂时完全摆脱工作。列宁说：从今天开始结束自己的公务，但要抓紧，以免被疾病弄得措手不及。

连着三天——12月13、14、15日，列宁忙着打电话，在家里接待一些同志。准备在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就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以及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分工问题写了几封信和便条，还了解了1922年的收粮储备情况和社会保障、居民迁移等问题。

12月15日至16日通宵 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疾病再次发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顾这种情况，在16日早上医生到来之前，还向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口授了一封信。11点45分，医生克拉默尔和科热夫尼科夫来会诊。列宁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去哥尔克村的建议，决定留在莫斯科。列宁委托克鲁普斯卡娅转告斯大林：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被迫放弃这次发言，深深伤害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12月18日 召开了俄共（布）中央全会。全会通过如下决议：在取得医生同意的条件下，可以把全会的决议文本通知列宁。全会还通过一项专门决议：责成斯大林亲自负责监督执行医生给列宁规定的生活制度。

12月20日 费尔斯捷尔教授探望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切地欢迎他，询问他是怎么来的。

——顺便提一下，这位德国著名的医生、神经病理学家曾解答了为列宁治病的医生们提出的疑问，因而引证他的话对于说明事件的后来发展是极重要的。这位教授说：“列宁的病，首先是由内在原因决定的。它按照内在规律无情地发展着，不取决于外在因素……假如列宁从1922年10月开始就处于休息状态的话，他

就失去了他在生活中得到的最后的快乐。完全摆脱一切活动，并不能防止他的疾病发展。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说，工作就是生命，无事可干就意味着死亡。”

12月21日 经费尔斯捷尔教授允许后，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信，表示他对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的决议满意，并建议通过一个向党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对外贸易和改进外贸工作措施问题的提案，并把他的这个建议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宣读。^①

当斯大林后来得知这封信时，在电话里粗暴地骂了克鲁普斯卡娅一顿，并以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威胁她，因为她记下了口授的这封信。于是，克鲁普斯卡娅于1922年12月23日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

“列甫·波里索维奇：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大发雷霆。我入党不是一天了。三十年来没有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事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我也是一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娜·克鲁普斯卡娅。”

这件事，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当时并未告诉列宁。因此，它绝不可能影响到1923年1月4日记录下来的对斯大林的评语。只是到了1923年3月初，列宁才得知发生的事情，并口授了一封信给斯大林：

“尊敬的新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且辱骂了她。

虽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这件事还是由她告诉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无意这样轻易地忘记

① 列宁的这封信，可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卷第312页。——译者

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因此，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您斟酌。

致敬。

列宁，1923年3月5日。”^①

后来，1926年7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的联席全会上又提到这个问题。正如乌里扬诺娃在写给全会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已经道过歉了。

——我们再重说一遍，这场冲突不可能反映到《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但这件事本身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参加者的道德水准。斯大林粗暴、冷漠、死板，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则十分克制、委婉、谦让。刚才我们援引的文件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并且，恐怕也值得想一想，剧作家米哈伊尔·沙特罗夫在话剧《继续……继续……继续！》中描写这个事件时，剧本中的斯大林嘴里冒出的那些脏话。

12月21日 列宁委托哥尔布诺夫请正在国外出差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协会会员拉皮罗夫-斯科勃洛火速订购两台录音机并交外交信使带回。列宁同疾病作斗争。列宁没有屈服。

12月22日至23日通宵 列宁病情加剧。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报告了一个坏消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情继续恶化，右手和右腿开始麻痹。从这时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再不能动手写字了。

12月23日 列宁请求医生允许他对速记员作5分钟的口授，因为“有一个问题使他不安”，他担心睡不着。在获得准许后，他（在晚9点）将沃洛迪切娃叫到住所。

沃洛迪切娃的记录如下：

“他口授了4分钟。他感到自己不舒服。医生来了。口授前他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请您记下来！’他口授

^① 见《列宁文稿》中文版第10卷第314页。——译者

得很快，但病痛时常干扰。口授完毕时他问我今天是几号，为什么脸色这样苍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这样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其中谈到增补中央委员会中的工人委员。

12月24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了答复医生们不允许他同自己的秘书和速记员谈工作的要求，便提出了一个通牒式的问题：或者是每天给他哪怕很短的时间允许口授自己的“日记”，或者是他完全拒绝接受治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概认为，给自己的口授取“日记”这样一个不足为罪的名称，较容易获得医生的应允。

在这同一天——12月24日，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同医生们协商后，作出如下决定：“1. 授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进行口授5—10分钟的权利，但这不应该具有通信的性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应指望这些记录获得答复。禁止接见访问者。2. 不论是朋友或家人，都不应把任何政治生活的消息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免得这些材料会引起他的思虑和不安。”

晚上6点至8点之间，列宁将沃洛迪切娃叫到住所，向她口授了（10分钟）《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二部分，内容有关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的个人特性问题。

沃洛迪切娃在日记中写道：“他告诫说，昨天（12月23日）和今天（12月24日）口授的内容是绝对保密的。他再三强调了这一点。他要求将口授的一切，放在一个特殊地点特别小心地保存起来，认为是绝密。”

对此，我们还要补充一件后来表明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沃洛迪切娃在1929年写道：“多余的草稿由我销毁了。文件的副本按照他的愿望保存在用火漆印封好的信封里。他还请求在信封上注明：弗·伊·列宁亲拆，在他逝世后由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亲拆。我在信封上没有写‘在他逝世后’几个字。”

——这里不得不扯得远一点，——璩莫夫说。——列宁不想

让别人，包括政治局委员提前知道他在这些文件中谈到的个人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妨想象一下，把列宁的口授记录提前泄露出去，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同事先约好的那样，12月23日记录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谈到增加中央委员人数，在当天就寄给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弗·伊·列宁的信件、便条和托办事件登记本》中记载了这件事。

——那么，12月24、25、26日记录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其余部分命运如何呢？

——文献中主要倾向于这种观点：只是到了1924年3月，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的文件转交给中央委员会时，列宁所有口授记录的内容，包括12月底的口授记录，才为人们所知。然而有文件证实了另一件事，福齐耶娃把12月29日以前的全部口授记录，至少通报给斯大林和别的政治局委员了。她在1922年12月29日写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解释说，她认为自己的行为没有错，因为好像沃洛迪切娃事先并未严格指示她必须准确地执行列宁的意愿。但是，只要注意察看我们刚才援引的列宁值班秘书们在日记上的记录，就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福齐耶娃的这些解释。

所以，政治局委员和一部分中央委员，已经得知了列宁对党的一些活动家所作的个人评语，尽管这些评语是严格保密的。

没有人把粗暴地违反列宁的意愿这件事告诉他本人。因为人们知道这会引起他的什么反应，同时也因为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信，他的遗嘱在党代表大会之前一直被极其秘密地保存着。

——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让我们把话题转回：

我们的日记上来吧。

——好，我们重新回到史料上来。

12月25日 列宁继续向沃洛迪切娃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二部分。